

（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追根溯源】	文革的根源：派系政治无法制度化	孙立平
【春秋史笔】	张春桥幽灵	王友琴
【往事非烟】	难忘的燕园·1969年（下）	吴 琼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追根溯源】

文革的根源：派系政治无法制度化

· 孙立平 ·

1、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客观上要求派系政治制度化，以容纳执政集团内部的施政分歧。实际上，从执政开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主要是上层），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就开始出现系统性分歧。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以红区和白区为主要阵营。其实，这种分歧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种分歧不要用简单的对错来理解，只是当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来容纳这种分歧。高岗事件便是这种分歧的高潮，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高岗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如“在党内拉帮结派”、“另立山头”、“分裂党”、“夺权”等。说明这些因素都是党内不能容忍的。而高岗事件的解决方式，也为以后类似问题的解决开了先例。

2、理念分歧与权力斗争是难解难分的。所谓理念分歧是高尚的，权力斗争是卑鄙的看法，是错误的。两者合在一起才是派系政治的全部。高岗事件的意义是表明，由于无法将派系政治制度化，只能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想象：如果当时坐在一起想出路，大家做一个安排，正式形成以毛为首的社会主义派和以刘为首的新民主主义派，形成派别政治的规则以及制度化的竞争方式，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根本重写（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3、派系政治无法制度化的根源，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政治模式。现代政党是以利益分化的理念为基础的，每个政党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而列宁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是以乌托邦为理念的，就是说，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类发展的方向，是真理的化身。利益可以是多元的，而真理是唯一的。因此，从这种党的理念中，生发不出可以令党内派系政治合法化的基础。不同的理念和主张，统统被归之为正确与错误的分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4、由此注定，党内分歧只能用路线斗争来体现，苏共如此，中共如此，诸共都如此。不是一山难容二虎，而是一理不容二主。于是有了中共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由于将不同的

主张等同于真理与谬误之别，同时派系无法公开化，无法也就注定了路线斗争的模式。注意，这里需要路线斗争模式这个词。非公开、无程序、残酷、零和博弈等。

5、无法制度化的派系政治，一般会有常态和非常态两种存在状态。常态化是指，在一场生死博弈之后，一方胜出，形成一个大家服从的权威，此时分歧处于潜伏状态，权威用常规的方式平衡或摆平不同派系。非常态是指，矛盾爆发，最后用残酷的方式分出胜负。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权威的存在是重要的。如果不存在这个权威，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往往是系列的激烈博弈产生权威，要么寻找制度化的安排。前者如延安整风之前到延安整风。后者还没有先例，因为要求的条件太高。

6、文革是非制度化派系政治的极端表现，是其非常态。这时的矛盾爆发，最后只能用残酷的方式分出胜负。在有关文革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争论一个问题，毛刘究竟是理念分歧还是权力斗争。其实，派系政治是更好解释，在派系政治中，两个因素是密不可分的。假如像前面设想的，在49年后马上对派系政治做出合理安排，形成制度化的竞争机制，断不会走到文革这一步。反过来说，由于没有这种安排，走到这一步也是必然的。可悲的是，人们对文革的反思仍然停留在某种主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把毛理解为恶魔。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冲破顶层边界，与民众结合，就是当时那个混乱的样子。

7、非制度化派系政治中的规则与潜规则。非制度化的派系政治，并非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对于一个具有90多年历史的老牌政党来说，频繁的路线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与潜规则。有的是形成文字的，有的是没有形成文字的，一般都称之为党的纪律。这些规则与潜规则包括（1）非公开化。不仅仅是过程要严格限制在相应的圈子中，并形成了整套的保密纪律，而且更重要的是严格禁止向圈子之外寻求支持。因此，外部的支持一般会恶化其在内部的处境。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家丑外扬等都是最被忌讳的。（2）检查、批判与羞辱仪式。一般地说，失败者要做出检查，然后接受胜利者或其他人的批判。其作用，一是对失败的认可，二是统一其他人的态度，三是对失败者进行羞辱。如果不接受这个仪式，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3）解决胜负以及对政治对手的处理，一般是使用内部纪律而不是国法。包括对刘少奇。据说抓捕“四人帮”前，征求陈云意见，陈云说，这次可以这么做，是特殊情况，但下不为例。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但要看到，在毛时代，是将政治斗争路线化，尽量淡化政治色彩，其目的是避免发生全局性的震动。而近些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只能逐步诉诸法律。

□ 原载《文摘》2012年06月8日

~~~~~  
【春秋史笔】

张春桥幽灵

• 王友琴 •

1976年10月6日晚，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张春桥等4人突然被逮捕囚禁，他们被叫做“四人帮”。当时他们占据了权力场排名前6人中的4个，张春桥是第4号权力人物。之前毛泽东的死亡与“四人帮”的被逮捕，是导致文革结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4年后的1980年底，特别法庭发起了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张春

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后改为无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医”，2005年88岁因病死亡。

如今中国的多数年轻人不会清楚地知道“四人帮”的4个名字，但是在2016年的关于文革发动50年的各类活动中，可以看到，“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的幽灵在飘荡。这先要从更早的时候讲起。

## 一、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年，柬埔寨制作的电影《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成为奥斯卡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示了柬埔寨人民怎样从城市的家中被驱逐，怎样到集体农场从事超强的体力劳动，怎样挨饿，怎样被惩罚，怎样死亡。红色高棉造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这部电影相当独特，人物是用黏土塑成的，电影插进了红色高棉时期留下的黑白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是当时的宣传品，穿插其中相当有效地增加了影片的历史质感，也有利于说明电影故事的由来和成因。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年轻（权力带给人外貌的改变）。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迎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与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柬埔寨取得了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及张春桥1976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当时普通中国老百姓既不了解柬埔寨正进行着什么样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了什么事，是那时候的“常态”。根据后来的柬埔寨政府的“国家历史记载”，张春桥在1976年2月访问柬埔寨。（感谢宋征先生帮助查找到这个日期，他是《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和红高棉“革命”的历史》的作者。）

关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做了什么？笔者翻译的《“民主柬埔寨”历史》（A Histor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一书中的“概论”写道：

“在1975年取得政权之后，红色高棉把200万住在金边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千千万万的人在撤离城市期间死去。

红色高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贯彻实行其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他们要把柬埔寨转变为一个乡村性的、无阶级的社会。那个社会里没有富人，没有穷人，没有剥削。为了实现这一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外来服装式样、宗教活动以及柬埔寨传统文化。公立学校、佛塔、寺庙、教堂、大学、商店和政府建筑或者被关闭，或者被改变成监狱、畜舍、再教育劳动营和仓库。没有公共和

私人交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非革命的娱乐。休闲活动被严格限制。全国人民，包括“民主柬埔寨”的领导人，都必须穿黑色衣服，那是他们的传统革命服装。

在‘民主柬埔寨’统治下，所有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权利。人们不可以离开他们所在的合作社外出。这个政权也不准许任何人集会或举行讨论。如果3个人聚会谈话，他们会被指控为“敌人”而遭到逮捕或者处决。

家庭关系受到严厉批判。人们被禁止表达甚至轻微的爱情、幽默及怜悯。红色高棉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被称为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3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3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在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

更具体的例子还有，红色高棉建立了几千人组成的大型合作社，作为消灭私有财产及资本主义的步骤。合作社被设计成在最大可能上自给自足，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在公共大食堂吃饭，尽管柬埔寨家庭在一起吃饭已经上千年了。当食品缺乏时，在公共大食堂吃饭使得饥饿更加严重。红色高棉关闭了商店。首都金边原是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强制居民离开，只剩下了四万人口和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只卖东西给外国大使馆的人。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没有完整的正规学校，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者人家里学习，他们的老师往往是只有很低的读写能力的贫农。到了1978年，有的地区在学校教育方面稍有改进，儿童可以得到每天2—3个小时的小学教育。在孩子们学习字母和拼写的时候，他们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是政治教育。另外，孩子们通常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住，不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照顾和乐趣。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傀儡的腐败阶级成员。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杀戮的目标，有数千名学校教师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了。受过教育的人只得假装不识字，他们只有隐瞒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训练才能幸免于难。在柬埔寨的华侨，虽然没有作为“中国人”被单挑出来进行群体杀害，但是不少中国人因为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作为“资产阶级”遭到杀害。红色高棉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拥有近200个监狱，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级的是在金边的中央安全中心，编号为S-21，关在那里的囚徒被指控背叛革命。这个监狱由一所寄宿中学改建而成，1万4千人死于这座监狱。这些杀戮和迫害是在红色高棉进行大规模社会重构的过程中发生的。对大批被指控的柬埔寨人的杀害，使得社会改造和转型能够得以进行，直到越南军队侵入，红色高棉退回丛林。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统治这个国家3年8个月20

天。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有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生活的急剧改变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3年8个月不使用钞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表面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的武器、食品及各种设备，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 Ben Kiernan 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4000万美元“礼物”，用以维持红色高棉的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1分钟长度。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是外国人，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他们也没有漏掉张春桥。这1分钟张春桥的镜头，点睛出了柬埔寨惨剧的意识形态背景。

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写作者，在我看来，纪录片中张春桥的1分钟内容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显示红色高棉革命与中国文革的直接关联，让我们对文革有更深入的认识。张春桥对红色高棉的热情指导，也显现了他计划在中国要进行的社会改造，虽然那些事情在那时候中国还“做不到”。

## 二、张春桥可以跟什么人“媲美”吗？

和柬埔寨电影相比，张春桥在中文世界里的待遇不同。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家书》。书分两册，一册用印刷字体排印，另一册是张春桥的手迹（他是书法家吗），文字内容却是一样的。两册书都是紫红色布面精装带烫金书名（少见的豪华）。在出版社关于此书的长篇介绍中，用了三个人的评论，其中的一位是瑞典的中国研究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他说，张春桥的书可以和19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书记葛兰西写的《狱中札记》“媲美”。

张春桥的书出版一年多了。沈迈克教授在新书介绍中做这样的评论，当时和以后都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说明或者更正。《现代汉语词典》上（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968页）对“媲美”一词的解释是：“美（好）的程度差不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甲和乙，或者A和B，可以“媲美”，前提是认为二者都很“美（好）”。葛兰西的那本书是否“美（好）”，本文不会讨论，问题在于：张春桥的书，“美（好）”吗？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虽然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却没有掌握过政权，没有更多机会实行他的理论，葛兰西的理论主要还是纸上谈兵。张春桥在这方面大不相同，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并列发出指导全中国的重要指令）副组长。他是发起和指导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重要文件的起草人之一。这两个文件规定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并制定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从文革最早的到最后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张春桥都参与撰写。1976年初张春桥去柬埔寨的时候，其他文革的重要

“笔杆子”陈伯达和王关成都被送进监狱了（这些人舞文弄墨，害人无数，却没有能力给自己建立一个安全保险的环境，文革当中不但受害者被害，作恶者自己也不安全），但是张春桥却从头至尾是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人物。他甚至在红色高棉的革命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

和葛兰西不一样，张春桥理论在 8 亿人口的中国实行过了，而且还指导柬埔寨相当彻底地实行了。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倡导了什么，引起了什么后果，千千万万人被迫害致死。对于张春桥的理论指导下的血腥和残暴，贫困和匮乏，亲历文革的中国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说张春桥可以与谁“媲美”的人，是在赞扬他的什么美（好）呢？

鉴于张春桥主要是因为对文革理论的贡献而得到了大幅度的职位提升成为第四号权力人物，鉴于他不只是写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和文章还具体领导了文革的重大事件，鉴于张春桥在他的“狱中家书”中对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并无任何悔过的表示，赞扬张春桥的这本书“美（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说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美（好）”。

这本《张春桥狱中家书》，除了张春桥在监狱里写的信，还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1966 年文革开始前已是成年人，也就是说，她在成年时期经历了文革）和一个叫做“凯蒂”的采访者的长篇对谈。凯蒂自我介绍是张维维在复旦大学附中的同学，现居伦敦，凯蒂的父亲花了几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虽然不知凯蒂的全名是什么，但她显然是相当了解文革的中国人，对文革没有语言和文化的隔膜。

在该书 302 页，凯蒂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张维维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更进一步的对张春桥的肯定。不但肯定了他的理论，而且断言张春桥理论比现在中国当局的政策好，不但能发展经济，而且不会有贫富差别。

大家知道，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经济发展得到公认。同时，出现的贫富差别也受到批评。张维维的说法让人吃惊：解决中国现在问题的办法，是按照张春桥的计划 / 道路做，也就是按照文革的计划 / 道路做。文革，美好还是不美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

评论此书的沈迈克与参与写作此书的张维维，虽然身份角色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没有为他们的至少是突兀的论点提出论据。尤其前者作为教授，他应该知道立论的方法。难道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还是他们本来就提不出论据？或者，他们把中文读者当作了糊涂健忘的傻瓜？连柬埔寨人都记着张春桥的恶行，而人口几近 100 倍于柬埔寨人的中国人全都忘记了？

好几年了，常在网上见到人们呼吁“文革真相”。文革 50 年后的 2016 年也有很多人再提文革话题。但 50 年后如果还停留在了解真相的层面，多少会被认为太初级了。两年前我写过文章，指出有“否认派”在否认文革的暴力迫害，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另有一种更快捷更彻底的否认方式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直接赞美文革。当柬埔寨电影艺术家认真寻

找和再现“遗失的影片”的时候，中国文革的“遗失的影片”面临的却是继续被否认，继续被“遗失”。

### 三、文革的历史还将继续被遗失？

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我把受难者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下来，放在网页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页的题为《文革受难者》的书里。这是一本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调查性叙述。

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试图分析文革实行的社会革命内容。我在《文革受难者》书的前言里写道：

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象“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

文革迫害和文革社会革命，我以为是文革历史写作最需关注的两个层面。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难者/迫害问题也就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红卫兵打死校长老师（仅仅我调查的北京十个女子中学，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详情可见我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2014），在“尊师重道”的中国社会中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监禁在秘密地点受虐待死去，连斯大林式的“表演性审判”，连秦二世时代在监狱里使李斯认罪的计算，都无需费事使用，这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的大破坏吗？不过，我还是主张把二者分开。因为前者直接导致人的死亡，而后的推行实际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大规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违背常情、后果惨痛的社会改造。

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年。尽管上海在人们的模糊印象里好像比较温和比较有序，其实上海的残忍是特别严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贴近事实看，在张春桥领导“打倒”了上海原领导人“夺权”以后，上海的迫害残忍度在全国领先。

我在《文革斗争会》文中指出“斗争会”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没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也就是假审判，连作假都懒得做（这当然不是“懒”的问题，而是破坏文明社会的司法制度的程度问题）。文革大量使用“斗争会”的形式。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利用这种优势，上海“独创”了电视“斗争会”。1967年，上海开了51次电视“斗争会”。各单位组织集体观看，看过后集体讨论加上立即仿照行动。观看人次上亿。（可见上海报纸上的电视斗争会通知照片。）

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建立在各个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监狱，在那里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我写了《文革牛棚》。在“牛棚”里，被关者不但失去自由，还遭到各种折磨，殴打，侮辱，甚至被杀害。“牛棚”本来是拴牛的地方，文革中成为每个单位都设立的关人的地方的名称。据我收集到的资料，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牛棚”一词的，是上海。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这个词，体现了“牛棚”这一迫害形式的正式化和社会化，

并对全国有示范作用。上海当局还把原来的少年管教所改成了关押成年人的大“牛棚”。数百人被关在那里。其中有在芝加哥大学1932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涂羽卿（1895—1975），他是物理学教授，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和中国基督教会领导人。他被关押四年半，被释放时已经病重不起。

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开始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的母亲那里索要枪毙用的五分钱子弹费。这种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实行。这不但是“恶”，而且是“邪恶”。

文革后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而上海当时的职工人数是二百万。也就是说，上海的文革受难人数比例，在职工中高达百分之零点五。上海还“揪斗”了17万名分属九个类别（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占百分之八以上。

即使文革的“群众专政”做法造成的广泛的残忍使得普通人对残忍“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但是要让人对这一套迫害人的犯罪做法视为“美好”，是不是可能呢？这是一个令人警觉的问题。

文革对人的迫害和杀伤，有文革辩护士说是“失控”或者“必要的代价”。且不说是否可以用人的权利和生命来做“代价”，我们还应该细看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五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斯大林对他的政敌布哈林等还举行了装样子的审判，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几乎所有的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长久的“审查”，经过重重“检讨”才一个一个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的说法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由施害者暂停迫害来把受害者“解放”的说法。）军队“军管”了所有的单位。一个并不可笑的例子是，我的好心和认真的编辑把我文章中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改成“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为是我打字的时候漏了“检”字。实际上，文革前的“公检法”，这时候不但被“军管”了，而且“检察院”已经被彻底取消了。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大量死刑判决都是由这个“公法”军管会发出的。

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资，其实就是减少工资，因为在五十年代，人们的工资是随着工龄在增长的。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也有过公共大食堂。人们不被准许在家中存粮做饭，尽管中国和柬埔寨一样，过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做饭和吃饭的。“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但是在文革中，又把这种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说成是所谓“走资派”的“罪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因而把人送到乡下去成了对城市人的威胁手段。对人民的剥夺从来没有达到这样彻底的程度。



和红色高棉关闭学校一样，文革中中国的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有五年不曾招生。恢复招生后，招生章程上只要求初中毕业就可上大学，这等于是取消了高中。1969年8月9日，在“林副统帅一号通令”下，全国一大批大学被迫在两三个星期内迁出城市。他们的“理由”是要打仗了，和红色高棉撤空金边居民的欺骗手段一样。一位物理老师悲愤地说，实验室仪器包装时填充用的稻草没有晾干，搬到外地后打开木箱，仪器都受潮生了锈，不能再用。北京的大学中，中央级的大学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了。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了军队的家属住房。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是一名从军队来的“王副政委”。“校长”的职务名称是文革后才恢复的。

文革有几项“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也就是说，大约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人被送去了农村。从时间段也能了解到这个情况。有12年的城市初中毕业生被大部分送去了农村，这些人口的比例就在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之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不仅全部下乡，而且都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初中毕业就可走人），削弱了城市（年轻人还未长到十八岁就被排除出去了），削弱了家庭（儿女被送到远离父母的地方，而家庭被看作私有制的基础）。有文革辩护士说“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借口。

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货币”。

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但不是原创性的文革理论提出者。他只是所谓“笔杆子”而已。在文革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在1975年的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

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现在这种疾病也仍未找到治疗的方法。世界的医生们仍然在为治疗这一疾病而努力。据说毛泽东至死也没有知道他的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知道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看看1976年9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61岁。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度和与私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实行建立一种新型的理想社会，而实际上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是残酷的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不是唯一的，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重要的，对他的赞美也是需要警惕的。

#### 四、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

近年来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张春桥被“妖魔化”了。真是这样吗？

“妖魔化”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形容某个坏人，说他／她像妖魔一样。这是一个比喻。因为人不是妖魔，所以说某个人像妖魔，会被认为带有夸张而受到批评。

张春桥的罪恶被夸张了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相比，比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还少十几个。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的罪恶，怎么可能是被夸张了呢？只可能是被缩小被减弱了。

“妖魔化”的另一个意思可能是，当我们解释不了某人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个妖魔，他／她没有我们正常人共有的人性，像是妖魔。

2007年，我为一法国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发表，中文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

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

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

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不但徐景贤的书是这样，而且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受难者的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相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悔罪心。他们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吗？他们是“妖魔”吗？

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麦克白》里表现麦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是否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要是张春桥和徐景贤看这两个戏，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心里会嘲笑麦克白和诸葛亮软弱可笑？他们才不会那样做呢。

如果我们用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也就是“妖魔”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做了残忍的事情为什么残害他人，其实很可能成为对他们的一种辩护。但是，事实让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妖魔化”不能做成。

《文革受难者》中有作家和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一口井里“自杀”。我把文革中的“自杀”上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才自我了断，而有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了“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互相“武斗”的“造反派”两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周瘦鹃。

周全1968年时还年纪很小。她说，她听说，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在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过“斗争”和“批判”。但是周瘦鹃在1968年被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

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

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

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

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干的。”（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

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研究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翻译在中国，周瘦鹃是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我原来不知道这一点，但我记得，文革中完全没有娱乐性的书看，是我的父母凭着记忆讲给我和两个妹妹听了那些有趣的侦探故事，也让我们懂得逻辑推理和幽默感。文革时代食品匮乏，精神生活也一样。这两方面的匮乏，文革后生长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

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一个二十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平常的不难理解的事情。但是张春桥在三十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三十年他写《狱中家书》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了吗？（这里只是举了周瘦鹃一个例子。）当然不会。由此看来，张春桥不是特别的妖魔，他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计的，是在愚弄人。他就是个坏人和罪犯罢了。

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比如，我写过的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的被指定被迫害的过程中，文革领导者是不认识其中的每一个人的，甚至不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有人还以此为施害者辩护，说这些残忍和野蛮行为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当然是一种无道理的辩护。但是在这种群体性的迫害中，还有一些是针对施害者认识的人的。这种迫害特别体现了施害者在个人道德上的恶劣和败坏。

细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

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这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在下一年里，文革迫害和杀戮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但是另一方面，见证者也会继续见证历史。对历史的准确的描述，是规划未来的基础。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像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一直欺骗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听到了林肯的这段话。我相信这段话。当然，破除谎言需要我们的努力。

□ 原载“熊窝博客”

~~~~~

【往事非烟】

难忘的燕园·1969年（下）

第五章 回到38楼的半年

燕园里，南阁是个美丽而迷人的地方。这里静谧而略显神秘，似乎躲藏有不少生命力充沛、欢乐的小精灵。在我和邓先生居住的那个房间的窗外，高大的松树和柏树身披斑驳白雪，一声不响地傲然挺立。各种各样的树木和灌木丛勾肩搭背，错落有序，悄然地把南阁和北阁环绕起来。小巧的灰喜鹊，黑白羽毛相间的大黑喜鹊和三五成群、机灵的小鸟们也害怕寒冷，无论白天还是晚间，它们都喜欢光顾这里，在一起团聚、玩耍、嬉闹或者睡一会儿觉。有时候，胆子大一些的麻雀或喜鹊，一两只或者两三只，看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或走动，还会好奇地飞到窗户外面小台子上驻足、行走、跳跃，甚至有时还会像演杂技那样，在窗棂子上勾足倒挂，窥视窗内的动静。我只要在房间里大声咳嗽一下，它们就会惊慌失措地展翅飞开，一会儿就飞回到积雪的树杈上，立图站稳脚跟，从脚底下抖落出一串串亮晶晶的雪花，一阵阵白烟似的雪雾。它们站在树杈上，还会掉转过头来，用大惑不解的目光默默地注视你……

一天清晨，我像往日一样，按照监管规定，手拿一把笤帚，低头清扫南阁一层的地面，老邓和红卫兵们还没有起床，忽然，看见我家的老六、上北京二中的大弟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冷不防到来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还立马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我挣开他说：“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这种地方可不能久留，有什么话，你快讲。”

弟弟讲：就在我逃离北大的那一天，军工宣队不但兴师动众地搜查了我家，而且，还搜查了我的女友马明明的家和男友梁宝璟的家。他们像清乡、围剿那样，团团封锁住附近的街道和几条胡同，甚至攀登上平房住户的房顶，一时搞得惊天动地，搅得左邻右舍住户们惶恐不安，一连几天都在议论纷纷，不断来到我家，打听我的生死消息。

弟弟还讲：因为母亲不知道我在北大出了什么事情，是死是活，所以心急如焚。她在被搜查的第二天，就焦急地乘公交车赶到燕园，好不容易才找到军工宣队办公室，开始询问情况，谁知军工宣队的接待人员，却给了她这样一番答复：“吴克思的母亲来啦？噢，您就是吴克思的妈妈吗？幸会幸会。您放心吧，吴克思没有死，他还活着。但是按照我们的规定，今天不能让您和他见面。还有，您一定要做好精神准备——准备过些日子到监狱去和他见面吧……”母亲听到这样的答复，立刻号啕大哭，是痛哭流涕离开燕园的。

最后，弟弟还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讲：我的未婚妻马明明原来一直在作我赴宁夏隆德工作的准备，还奇怪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拿到毕业分配的派遣证。北大军工宣队搜查了她家之后，她才知道我在燕园里出了大事……她怀疑我已经自杀，不在人世，从此日夜伤心哭泣，心脏病发作……她现已住进阜外医院重症病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病情相当凶险，医生已经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单。

自从弟弟来南阁探望之后，我总是挂念明明的病情，从此心烦意乱，神不守舍，坐立不安……

1969年3月，果然，原来的军工宣队撤离北大，以8341部队为首的、新的军工宣队开进了燕园。此后没过多少天，郭罗基、邓艾民就被释放，可以回家了，可是，我却依

然处于被监管状态，不能毕业分配，也不准回家。新的专案组安排我回到了38楼食宿，一晃儿就是半年。

回到38楼后我才了解到，在我被关押在东语楼和南阁的那几个月，哲学系师生员工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都被集中到了38楼集体食宿，按年级和班次划分为连、排、班，过起军事化的生活，每天军训、跑操、立正、稍息，在各个寝室中读毛著，学习文件，讨论大好形势，“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活动。除了患重病不能动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身体状况如何，家中有无困难，一律如此。而以8341部队为首的、新的军工宣队来到以后，虽然给师生员工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身体上松了绑，不再要求大家一律食宿在38楼，但是，在精神上并没有给大家松绑。新来的军工宣队按照“斗批改”运动的需要，把全系人员重新排列重合，新老搭配，组编成许多军事化的学习、战斗小组，小组里主要的战斗力构成是69届、70届的学生，然后“掺沙子”，加入几个领导干部和教员，以及有问题的教员学生。每个小组，当然要由一两个军人或工人牵头、领导。师生员工们就这样被组织起来，彼此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一股股新的战斗力，开展一场又一场深挖并斗争暗藏的阶级敌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旧思想，改革旧教育体制和创建新教育体制的“斗批改”运动。

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在38楼一层一个寝室里活动。小组主要由70届的十几个学生组成，由新华印刷厂的两个工人为领导，小组成员中还有中哲史教授张岱年先生、副教授朱伯昆先生，西哲史讲师朱德生先生和李真先生。人人都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向大家披露个人隐私，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经历，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还要经常“斗批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此外，当时最有时代气息的小组活动，就是人人必须参加、绝对不可以拒绝的“早请示”、“晚汇报”和“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毛主席语录》须臾不可离身，毛主席像章绝不可以忘记挂在胸前，否则，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众目睽睽之下的异类，一定会受到军工宣队的怀疑和质问。尽管早在1965年“文革”发生前，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便承认中国存在对他“个人崇拜”的现象，后来，他也说过对这类现象“讨嫌”，但是，当时林彪和江青却把“个人崇拜”煽动得达到无以复加、狂热、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各地大跳“忠字舞”，燕园内也如此。在38楼下面，在一棵大树底下，以一块大石头为中心，就有不少哲学系和外系的人跟风，围起一个大圈子跳起来，舞起来。那些虔诚、可笑又离奇古怪的舞蹈动作简直不堪入目！我每每在小组寝室里学习、讨论时，听到外面传来的这种宗教般的歌舞声和跺脚声，就感到恐怖，常常紧张地抬起头，打量一番在场的小组成员，同时，头脑中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发誓要一生追求真理的、我的同学们，还是熟谙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王充、范缜，熟谙西方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那些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我的老师们，为什么会容忍这种新的宗教迷信呢？——是的，我想，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确实有难言的苦衷。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错误的政治，必然需要有精神方面的错误形式来加以配合，如果要反对这些错误的精神形式，一定会受到政治的高压、严惩。当时，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只要有一个人敢于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这样做不对！这是丧失理智！这是搞宗教迷信，是愚昧，是反动”，那么，完全可以预料到，这个大智大勇之人，立刻就会被颠倒是非地打成“反革命”，甚至会被“专政”、枪毙，而且，连尸体也不会保留。

在我回到38楼那半年里，新来的军工宣队所领导的“斗批改”运动，仍旧是原来的军工宣队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只不过与原来的军工宣队相比，这次军工宣队在“清队”工作中更讲究谋略和策略，显得更有步骤，更有章法。在这次新的“清队”运动中，第一阶段，军工宣队先把清华大学一些已被清理的“阶级敌人”，“叛徒”、“特

务”、“走资派”用大汽车拉到燕园，在东操场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其中，就有“中国有三钱，不怕没有原子弹”的“三钱”之一钱伟长教授。在大会主席台上，在迟群和谢静宜的亲自监督之下，钱教授在发言中一直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交代自己是在政策的感召之下，向军工宣队坦白交代自己严重的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第二阶段，就该轮到深挖燕园里躲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操场又开了一次全校大会，开得真可谓轰轰烈烈，令人目瞪口呆。在这次大会上，竟然揪出了一个“中统特务”，而且，这个“特务”就在哲学系，是个副教授。在场的哲学系师生当时纷纷站起身来，伸长了脖子往台上看，大吃一惊！原来，哲学系的这位副教授，居然是和我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共同战斗多日的中哲史教员朱伯昆先生——可是，令人大可回味的是，过了一些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些在当时“清队”运动中被打成“阶级敌人”，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各种政治帽子的人，绝大多数又被平反昭雪。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确实发人深思，值得各方面认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高压下，包括燕园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三缄其口，或者，言不由衷地采取应付态度，因此，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了一些人处理问题的主要依据；当然，也有极少数个人利益熏心的小人，利用这种非常时机，投机取巧，堕落成为两面派、阴谋家和野心家，为人们所不齿。

回到了38楼那半年，我就是在这种时代气氛中，而且是在“群众监督”之下，参与燕园里各项政治活动的，可以说没有丝毫快乐可言，也正像屈原在《离骚》里所说的那样：“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我异常痛苦地度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大约是在我回到38楼之后两个月的一天，军工宣队专案组终于允许我走出燕园，去市区看望亲友了；但是，每个月只能回去一天，次日一早必须返校。就在那一天，我回家看望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到了晚上，又到阜外医院，看望了病危中的未婚妻马明明。

第六章 未婚妻之死

亲爱的读者，在这一章里，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文革”时期凄惨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包括其中的种种细节完全是真实的。它就发生在我身上。它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每每回忆起来便格外伤心……

马明明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但是在三年高中时期，也就是在1961年—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那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与现在不同，由于家庭和学校的严格要求，所以，我和明明只是一般要好的同学，两人之间并没有男女爱情可言。

但是，男女之爱的种子是那样的奇特和神秘，它仿佛很早便钻入了少男少女的心田，然后，才慢慢地发芽、成长并经受多次风霜雪雨的考验，进一步成熟起来。

那还是1961年的10月初，我从北京市区的北京五中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郊区刚刚建立起来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因为我还不习惯北大附中的集体住校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忍受不了那时刚刚开始“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天天遭到的腹中饥饿的折磨，所以，我找个理由，从北大附中转学，转到了市区离家较近的、故宫和沙滩附近的北京65中。当我到65中报到入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到家里后不久，就有两位65中的同班女生，手拉着手来看望我这个新同学，其中一位就是马明明。马明明不解的向我道：“你为什么从那么好的学校转到65中呢？”我如实回答：“因为回到自己的家里，吃饭可以吃得多一些。”明明又问：“你在北大附中学的是俄语，转到我们班后要学英语，可有困难？”

我见她态度诚恳，长得样子又好看，就厚着脸皮说：“那就请你以后多加帮助。”当两位女生离开我家，挥手同我告别时，我和母亲把她们送出胡同口，母亲抬起手来，指着明明的背影，似乎无意地对我说：“那个女孩子长得好美！红毛衣，长辫子，雪白的皮肤，修长的身子，说话也温柔得体——你不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吗？”

自那时起，我对明明便产生了好感。是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缘分”、“命运”。

明明的家离我家其实相距不远，一个在东四12条，一个在东四13条。高中三年，我们经常一起乘坐公交车和无轨电车上、下学。她是回族，出生在一个无忧无虑、温暖和睦、有教养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兵工厂的中层干部，母亲是特级中学数学教师。明明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长有一双明亮、和善、动人的眼睛，言谈举止大方而娴静，比今天央视一台的播音员李修平还显得文雅。记得上高中语文课，班主任女老师在讲授汉代乐府民歌《焦仲卿妻》时，曾经在讲台上这样讲过：“古代焦仲卿妻兰芝长得真美呀！就像你们班在座的马明明同学。”

明明的学习成绩也相当好，文理科都名列同年级六个班女生的第一名。她在参加1963年的高考时，选择的作文题目是《五日记》，获得北京市高考作文第三名。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她5岁时患猩红热，发高烧，转成心脏病。因此，她虽然也参加了高考，但是在体检复查时，医生认为她的身体情况无法适应紧张的大学生活，所以，她最后竟未被大学录取，有关方面安排她到一所教师进修学校教语文，明明从此走上了工作岗位。

高中时，有三件发生在我和明明之间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发生在高一时，一部分同学在放学后还上晚自习，我也没有回家吃饭，在教室里做作业。明明那时在学校入伙吃饭，发现天晚了还饿着肚子，就从学校食堂买来几块红薯，放到我的课桌上，立即引起了几个坏男生和一两个嫉妒明明的女生哄堂大笑和议论。我抹不开面子，担心同学们认为我和明明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就把那几块红薯胡噜到教室的地面上。明明见我这样不领情，趴在课桌上啜泣，从此不爱搭理我。第二件事发生在高二时，全班同学参加“十·一”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群众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儿地分头回家。当我和明明等几个同学走到灯市口时，明明的心脏病忽然发作，手扶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一副很难受的样子。天已很晚，同行的几个同学陆续离去，只有我陪伴着她。后来，明明的父亲和母亲前来寻找，接她回家。明明在父母的搀扶下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时，回过头来非常感激地对我点了点头。第三件事是在准备高考、最后冲刺那一个月，明明和我相约，一起到北海公园西面的北京图书馆复习要考的功课。每天我俩都是一早就乘公交车和无轨电车，来到北京图书馆那个绿树成荫的大院子里，分别找个最安静的角落，中午各吃各的从家里带来的盒饭，直到黄昏时分，看不清书本上的文字为止，这时，我和明明才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催促着回家。

是的，凡是真挚的爱情，总是以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为思想基础，一般也会经历一些曲折，甚至经历一些情感的痛苦折磨，最后才能达到心心相印、灵肉一致的美好境界。

自从我踏进燕园，开始紧张的大学生活以后，同明明的来往就很少了。但是当“文革”发生以后，在1966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回家后又到张自忠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看大学报，遇到也在看大字报的明明。她邀请我到她家，介绍北大和全国形势。此后几个月，每逢星期天我从北大回家，又往往去明明家里，和她一起看有关“文革”的动态资料和小报，同时，议论时政并交流思想。我认为，正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担忧，把两个高中同学的心联系起来，使我们有了思想感情基础。在这种越来越有吸引的交往中，我发现明明与

高中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她的外貌具有一种青年女性的成熟之美，而且，她的头脑也聪明睿智。人们常说，患绝症的人也有过人的智慧；见到此时的明明，我对这句话才真的信服。例如，明明对于“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往往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力，能够一语破的，洞察到主要矛盾所在和问题的实质。她很早就通过综合分析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材料和自己看到的大字报内容，对那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抱怀疑态度；她多次表示担忧，担心“舵手”导航会出现重大失误。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也正是在与明明交心交往的那段时期，才促使我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社科书籍，顿开茅塞，石破天惊，形成了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系统的观点。

就这样，在那段时期，在我和明明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也渐渐萌生出了一种新的感情。两人单独相处时，自然也谈到了男女之爱，谈到了《西厢记》、《红楼梦》，以及《简爱》、《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但是起初，我们俩几乎一致认为，青年男女之间不一定非是爱情关系不可，像古希腊柏拉图所讲的那种“精神恋爱”也很不错。但是，此后在我和明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以上这些想法和说法，只不过是对于我们之间已经发生爱情的一种掩饰，是我们已经步入爱河的一个序幕，一首前奏曲。

1967年5月1日，明明提出，两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参加当晚在公园里举行的游园活动。我很高兴，认为我们的关系就要前进一步，我有一些心里话可以单独在游园时对她好好讲了。但是，到了公园北门发现，她是带着妹妹小颖一起来的。这使我感到很不舒服，认为她的这个做法似乎说明她对我和她一起游园还有所顾虑，甚至有所防范。我的兴奋心情一下子转化成烦恼。“五·一”的游园活动虽然还是在“文革”时期，但是游园的人仍旧不少。五光十色、耀眼的礼花冲破夜空，从沉静屹立的白塔后方升腾起来，照亮了波浪起伏的北海海面，也照亮小颖妹妹欢乐的脸，但是，我和明明都笑不起来，心里都交织着很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行三人缓步走在公园北岸，都很少说话语言。我们还没有走到五龙亭，就觉得这次游园索然无趣，从那里折回。可是，在回家乘坐的13路公交车上，在非常拥挤的人群中间，而且，就在妹妹小颖的身旁，明明似乎是为了对我表示一种歉意，为了给我一个弥补，也是为了表达她心中积蓄已久的爱意，突然，一下子挽起我的左臂，而且，把我的左手按压在她那高耸、柔软又发热的胸脯上，使我惊喜万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倾慕已久的姑娘的肉体，当时屏住气，像被闪电击中，一动也不敢动，眼望车窗外，不敢和她四目相对。正是她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表达爱情的方式，使孕藏在我内心已久的爱情种子，一下子彻底苏醒、萌发了。

就在“五·一”次日，我拿到两张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行的歌舞演出票，下午，马上去明明家找明明。但是，她仿佛已经料到这天我要去找她，仿佛她对前一天晚上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害怕，仿佛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旦突破的前景感到担心，她去了姥姥家，很明显，她是有意回避我。我不甘心，于是，让明明的小弟把我带到明明的姥姥家，把明明唤出来。明明心慌意乱地靠依在姥姥家的半扇大门上，表示不大想去。但是，她拧不过我，于是，晚上终于陪我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厅里，两个人亲密地坐在一起。音乐厅的舞台上，上海歌舞团在演出当时流行一时的革命舞剧《小刀会》和《红灯照》，几十个男男女女演员，手举着金光闪闪的红灯笼和银光闪闪的义和团、太平天国的大刀和长枪，舞来舞去。台下，在嘈杂的歌舞声中，我握住明明的一只白皙、细长、微微抖动的手，非常诚恳地向她倾诉了多年来对她的爱慕之情，同时，表达一生只爱她一个人，将来一定要与她结合、灵肉一致的决心。

那场节目还没有看完，我和明明就走出了剧场。一个在剧场外面等演出票的小青年伸手要我的入场券，我在掏票给他时，把衣兜里买好的一包糖果也掏出来，五颜六色的糖果撒了一地。明明“咯咯”地笑着，一手提起花裙子的下摆，弯下腰，一手在地上摸索，一一捡起

那些糖果，带着羞涩和兴奋之情，把糖块交给我。我们选择了公园的一个安静、有灯光的角落，双双坐在一条长椅上。明明扬起容光焕发的脸，略带歉意、恳切地对我说：“这可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你要考虑好——我的病，很可能不允许我们有后代。”我回答她说：

“我的决心已下，决不动摇。既然我们都知道人生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于怎样度过、有无应该追求的正确价值，那么，爱情的意义也不在于有无后代。如果我们将来实在想要个孩子，可以从兄弟姐妹那里过继一个。”我和明明肩膀相依走出中山公园，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真大，真开阔啊！长安街上一盏盏高大的街灯灯光映照着我们幸福洋溢、年轻的脸。五月的晚风清爽而舒适，空气是那样新鲜而醉人。明明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真高兴，像是在做梦，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孤独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我说：“我也是，好像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生。”

我回到燕园没过两天，便收到一封用小小的、秀丽的字体写来的信。这信是明明写来的，信中只有不多的30个字：“亲爱的琼：我好幸福。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它属于了你。”

可是，过了几天，我又收到明明寄来的一封信。信纸显然带有泪痕，信是这样写的：

“琼，我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又给你写这封信，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原谅，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把我们的决定向父母讲了，他们表示反对，坚决不同意，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很难过。但经反复考虑，我想，还是应当尊重父母的意见，他们有人生经验，也是为我们好。从今以后，就让我们做最好最好的朋友吧。我至死都会珍重你对我的这份难得的情意。请允许我做你的好妹妹，我今后永远把你看作我的好兄长。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像过去那样经常来往。”

接到这封信的当天傍晚，我就乘坐公交车赶到明明家。明明的父母为我做好一桌丰盛的回民饭菜，但是，我和明明都吃不下去。饭后，伯父跟我做了一次严肃而诚恳的谈话，他的主要意思是：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是明明和我结合的障碍，惟一的障碍是明明患有心脏病，不能结婚；如果结婚，遇到不测之事她就会早亡，所以，希望你们之后只做朋友，这样对她好，对你也好……但是，听了伯父的话，我表示反对，双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发生争吵。这次谈话，伯母没有加入，但明明一直在场，谈话持续得很晚。最后，还是明明把谈话打断，批评我的态度不够冷静。我垂头丧气地回到燕园。

此后则是一段很难过、令人难熬的日子。尽管我也曾去过明明的家，可是，两个人见面的情形已全然不同。有两三次，当我刚刚走进她家那花草簇拥、收拾得干净利落、宁静的小院时，听到明明正在屋里忧伤地轻声歌唱格鲁吉亚民歌《苏丽柯》和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再以后，明明便第一次入住阜外医院。她出院后，想不到伯父和伯母主动把我请到她家，做了一次长谈。他们竟然同意我和明明相爱，而且，同意我们订婚！这真使我和明明感到意外！

原来，明明当初虽然给我写过中断恋爱、只做一般朋友的信，但是在父母的面前，她始终未退让一步！她明确告诉父母：“生命属于我自己，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爱他，是真爱，不是可有可无的那种爱。即使将来发生不测、不幸之事，付出生命的代价，粉身碎骨，我也绝不后悔！”只因担心这样继续下去会加重明明的病情，危及她的生命，明明的父母才不得不作出妥协。当明明出院后，边落泪、边向我讲述这些时，我深受感动，也不禁落了泪。我第一次感激、深情地抱吻了她，领略到她那鲜红、美丽的嘴唇是甜的，醉人的……

再以后，就是我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了。经过反复商量，我和明明选择了我去宁夏隆德。这个选择不仅是因为我去那里能够得到锻炼，也因为那里是回族自治区，适合明明的生

活习惯。再者，明明有几个亲戚在宁夏，我和明明以后在宁夏生活，可以得到亲戚们的照顾、帮助。

不过，就在我已经报名去宁夏工作之后，有一天，我在和明明见面时，谈及军工宣队开进燕园展开“清队”运动后发生的不正常情况，也谈及我的一些顾虑。我对她说，现在北大揪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揪出了许多“反动学生”。我还对她说，如果我也被揪出来，恐怕经受不了那样可怕的批判斗争和人身侮辱；也许，就活不下去了。记得明明是这样劝慰我的：“不要多想。那种可怕的事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即使真的落到你的头上，你也要活下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我。我现在能够没有你吗？你如果不在人世，我也就无法存活了……”

然而，我哪里会料到，种种不幸的事情果然真的发生了呢？

1969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北大军工宣队第一次批准我回家探望亲友的那个晚上，我忐忑不安地走进阜外医院的一间重症病房。病房中只有明明一个病人。她躺在病床上，头部被枕头垫得很高，发着高烧，还处于昏迷状态，漆黑而卷曲的长发遮掩了她一部分雪白的额头，裸露出来的那部分额头和脖颈上，不断冒着亮晶晶的汗珠。从她的一个嘴角处，不时流淌下一股股红色的血水。她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在忙碌，有的用浸湿的纱布，揩她嘴角留下的血水；有的在观察“嗡嗡”作响的几种医疗仪器；有的蹲在床边，用一个扁平的便盆为她导尿。伯母俯身握着明明的一只手，对昏迷中的她说：“明明，明明，你看谁来啦？你睁开眼睛看看谁来啦？你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呀！”可是，她没有醒，仍旧处于昏迷状态。忽然，我看到明明在病床上开始扭动身体，而且，喃喃地说起不连贯的胡话。她说的是：“不白之冤啊！不白之冤……牛虻……保尔……一个丽达，又一个丽达……是个好姑娘……红毛衣，长辫子，雪白的皮肤……修长的身子……一只天鹅，像一只天鹅那样美……”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扭动身体，发狠似地说：“该死的！你这该死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是死还是活着……”

听到明明在昏迷中说的这些胡话，我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心中不禁涌出一阵阵酸楚，眼中涌出一股股热泪。我把握住她的一只手，焦急地说：“明明，明明，我来了，我还活着。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快醒醒，快醒醒！”但是，她一直没有醒，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夜已至深，我徒步回到母亲家，次日一早返回了燕园。

1969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又走进阜外医院的病房区，在进入那间重症病房之前，伯父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已经醒过来了。病情有所好转，但仍不稳定。你见见她可以，但是不可久留，免得引起她情绪过于激动，病情发生反复。我先回病房去，说说你的情况，让她有个精神准备。过半个钟头，你再进去和她见面……但你也只能呆半个钟头。”

半个小时后，我走进那间病房，只见伯父、伯母分别站立在病床左右，两个人一个人拉着明明的一只手。明明仍然躺在床上，新剪的头发整整齐齐。她的双眼格外明亮，显然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望穿秋水般地等待我的到来。当她看到我真的出现在她面前，是个活生生的人时，万分激动地左看身边的父亲一眼，右看身边的母亲一眼，双眼闪耀着泪花，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好像在说：“这难道是真的？他还活着？”我奔向前去，和她轻轻地拥抱了一会儿，仿佛隔世后又重新团聚。我和明明仔仔细细地彼此打量对方，都落了泪，激动不已……过了一会儿，伯母对明明说：“该吃药了。这次就这样吧。以后他还会来常看你的……”伯母在送我走出病房时，在楼道对我说：“唉！真是个痴心的孩子！”伯母还告诉我：在这次给明明修剪头发时，明明说她两耳旁的鬓发不能剪，因为琼一直喜欢……

1969年7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走入阜外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房间里虽然有两张病床，但是只有明明一个病人，明明的妹妹小颖在陪护。不知道什么缘故，这次明明接待我的态度显得矜持而有些冷淡，她坐在病床上和我谈了一会儿话，询问过北大的情况之后，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严肃口吻，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看来，你的事情可能不像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坏，你也许能够顺利毕业。可是，我的病情却很难说，很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你一定要有精神准备。现在，我只有一件事想求你答应：我万一不幸去世，你不仅要孝顺伯母，也要孝顺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弟弟还小，今后你要尽可能给予帮助。——还有，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我们的爱……”我听到这样的话，热泪夺眶而出，但又尽力抑制住了悲伤，也许是过于乐观，一再劝慰她不要多想，同时，也答应了她的要求。上午10点，明明的母亲来到病房，替换下小颖妹妹。我临走时，深情地亲吻了明明的额头，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左脚。伯母送我时，说明明的病仍然不好，危险。我还宽慰她一番。

不料，这就是最后一次探望，竟然是和我心爱的未婚妻子的诀别！

1969年7月24日，天气闷热，外面默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燕园里一派昏暗。我攀上38楼寝室一个双层床的上铺，正准备开始午睡时，突然听到有人猛敲寝室的门，叫唤我的名字，要我去38楼二层军工宣队办公室接紧急电话。我知大事不好，忙跳下床，冲出房门，在38楼一层与二层楼梯拐角的窗台上，看到一只小麻雀被雨水淋湿，身体缩成一团，正在惊悚发抖。我拿起电话，听到明明的父亲在电话那一端，用一种异样的声音喊道：“快来阜外医院！明明不行了……”

我顾不得穿衣打伞，只穿一个挎篮背心，冒雨赶到医院，在太平间，看到明明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们正围在已经死去的明明周围，伤心地哭泣。明明的遗容虽然安详而坚强，但是，还在睁着双眼，她死不瞑目，仿佛在幽怨地质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次日上午，天气非常非常热，盛夏的毒日炙烤着大地和城市。一个头戴回民小白帽的中年汉子，双脚蹬着一辆载有明明遗体的黑色灵柩的三轮车，行驶在前；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骑着一辆自行车，汗流浹背，跟随其后，陪伴着死去的明明从阜外医院出发，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四、府右街，路经我和明明高考前复习过功课的北京图书馆，再经过中学时代我俩经常结伴儿行走过的东四，到朝阳门；从朝阳门外再往东南，最后，到达日坛附近的一个清真寺。在清真寺一个偏僻的小屋里，按照回民的宗教习俗，几个中年妇女把明明的遗体清洗干净，又在遗体外裹上一层又一层雪白的尸布。大胡子阿訇念了《古兰经》。亲友们鱼贯进入小屋，围起死去的明明放声恸哭。一位中年妇女并不知道我和明明的关系，在众人的哭声中叹惋道：“可惜，真可惜啊！一个多么年轻、美丽、纯洁的姑娘。主啊！还是个处女呢……”

众人又簇拥着柩车，头顶烈日，踏着长长的、尘土飞扬的土路往东走，再往东走，拐了个弯儿，还往东走，最后，来到一片四周长有黄澄澄麦子的空地上，把明明的遗体土葬，推上一个长方形的坟头，但是，并没有竖墓碑。我留意到，在埋葬明明的坟地附近有一条小河和一个小水坝；远处，还有一个简陋的游泳池，隔着一些树丛，从这里可以听到孩子们在游泳池那边传来的一阵阵欢乐的叫声和无忧无虑的大笑声……

自此以后，我从外地只要有会回到北京，就一定要到这里来一次，在明明的坟前凝神伫立一会儿，心中充满难言的哀伤和针扎般的痛苦。

第七章 别了，燕园

不能毕业分配，仍旧在北大38楼接受“政治审查”和“群众监督”，如今，未婚妻又因我被“政治审查”、受到精神刺激而病故，我感到十分内疚，情绪更加低落，在燕园里过着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生活。好在燕园中，像我这样不知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人不在少数，就是所谓的“反动学生”也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例如，那位曾经自我揭发批判、又揭发批判我的“井冈山”战友，以及他又向别的人散布“反革命言论”、其他人又被他揭发，从而受到了牵连的一个个男生、女生。这些学生在早晨集体跑操，在食堂三餐打饭，晚上在未名湖畔散步时，几乎都能遇到。大家都不晓得过了今日明日又如何，不晓得这种受压抑、令人烦恼的日子何时才能告结束。

白天上、下午，我总是在38楼一层那个寝室中，同学习小组里的工人、师生、干部在一起，周而复始地学毛著、讨论、“斗私批修”、“活学活用”、参加“清队”运动；只有到了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寝室，才有条件看些自己想看的书，同时思考一些自己想思考的、有价值的问题。

在那段即将离开燕园的两、三个月里，我阅读了外面包上《毛选》的封面，而里面的内容却不同的书籍，例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多雪的冬天》、《州委书记》，还有从家里带来的几本内部发行的蓝皮书；也翻看了几大本非法出版的、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我读这些书籍时，主要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列宁说过，历史喜欢和人开玩笑，人们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立志通过革命、专政而消灭剥削、阶级、压迫的共产党人，难道在取得政权以后，真的在党内滋生出了一个“新阶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从柯切托夫小说所描写的苏联社会的情况看，在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出现了这样的“新阶级”；而从“文革”运动中各地人民群众张贴大字报所揭发的大量情况来看，中国高层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也相当严重，远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想象。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思索，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造反有理”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最高指示”不难理解，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从“文革”发生发展的种种情况看，从毛泽东落实他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实践结果来看，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很不利。总之，“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甚至是逆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倒行、反动。那么，究竟孰是孰非？中国要到哪里去？这确实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再者，从毛泽东青年时代便树立起来的社会理想看，可以发现，其中早就含有一些封建社会小农“平均主义”的思想，从他后来未公开发表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和已公开发表的《五七指示》看，其中确实有些违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果中国真的取消了社会分工、取消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流通，演变成古代斯巴达那样的一个军事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演变成另一个“太平天国”，那么，很难想象中国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子。那种国家和社会形态难道是我们应该效法、追求的吗？

但是，毛泽东关于人类社会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那段著名的论述，关于“有压迫就有反抗”以及“造反有理”等等论述，我认为还是正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和将来遇到的种种问题，又必须抱乐观的态度。这也正如老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始终存在，虽然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会遇到一些特殊、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起经验，人民群众总会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

力，最后也必将会胜利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至于国家社会中的许许多多的个人，那就正如苏东坡所说的：“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每一个个人，只不过是茫茫宇宙和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的小米粒；每一个个人，只要顺乎、而不是逆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只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不是为反动事业尽一己的微薄之力，那么，人生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值得肯定的。而当国家社会遇到时代难题的时候，个人有时既无法逃避，也无法反抗，有时，最好的方法只能是等待，因为，解决这类问题常常需要条件的成熟和一定的历史机遇……

已经到了1969年的10月。

一天傍晚，我走出燕园，到中关村31路公交车站附近散步，巧遇刚刚下车、冬季我逃离北大时曾经给予我帮助的郑金铃。她主动和我打招呼，问了问我目前的情况，还挽起我的手臂，一起到中科院那树影斑驳的林荫路上散步。我向她诉说了明明去世的情形和目前的郁闷心情。她劝我不能这样消沉，还是要积极乐观起来，同时，她提出愿意作我的朋友。我答应了。

但也就在我和郑金铃巧遇的第二天下午，军工宣队把全校师生员工集中在大饭厅，召开了紧急大会。会上，军工宣队传达了“副统帅”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和“一号命令”。随后，在一周之内，北大各系师生向外地疏散。哲学系教师大部分去了江西鲤鱼洲。学生们去了北京房山。燕园里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路上很少有行人，一派萧落的景象。

一天晚上，北大军工宣队学生专案组的几个负责人，把七八个系的十几个所谓问题最严重的“反动学生”（其中还包括有研究生），集中到哲学楼的一间教室里，传达了对这些人的处理决定：第一，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第二，揭发材料全部销毁；第三，先去河北宣化4630部队军工厂劳动锻炼一年，一年后，分配工作。……此后，又过了两天，就在38楼哲学系军工宣队的办公室里，在专案组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我亲自点火，烧掉了揭发我的全部材料。在焚烧那些材料时，我注意到，那些揭发我的材料并不多，全部材料只装在一个“卷宗”袋里。

1969年10月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一辆深绿色的车用卡车驶出北大的东南校门，驾驶室里有一位司机，他俩都是河北宣化4630部队的现役军人。军用卡车上站立有不到20位终于获得解放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和大学生。这辆卡车向中关村西北的方向驶去。当这辆卡车正开始加速的时候，站在卡车上的我，忽然看到前方马路旁的人行道上，迎着卡车正在行走上班的小学教师郑金铃。她穿着一身浅黄色的毛料衣裤，她居然看到了站在卡车上的我，于是边微笑、边向我挥了挥手。我也边微笑、边向她挥了挥手……

别了，燕园。

第八章 尾声

我在河北宣化军工厂劳动锻炼一年之后，被分配到河北衡水地区师范专科学校任教8年，32岁时才结婚，妻子是一个北京知青、衡水地区医院的护士。改革开放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1978届中哲史硕士生，三年研究生毕业后，又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工作8年。因为感到我国的军事基础理论和战略学基础理论薄弱，我在任教期间，开始研究德国近代克劳塞维茨撰写的世界名著《战争论》。1989年，因妻子患脑瘤不治去世，女儿幼小，我转业回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同时，继续研究《战争论》和战略学。我1998年退休后，并没有中断研究工作，近20年来，一直给北京大学和深圳华为公司等院校和

企业讲《孙子兵法》、《战争论》，以及英国现代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和美国当代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多年以来，我总觉得未婚妻马明明每天都在天上关心、注视着我，所以，我没有理由休息，只有理由尽心尽力地工作。

吴允曾先生已于1987年去世，终年69岁。我在北大做研究生期间，曾经多次到无名湖北岸的备斋，向吴先生请教逻辑学问题。有一次，我还陪同在地矿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工作的哥哥，一起到备斋，请吴允曾先生解决哥哥所在单位的一个理论难题。

邓艾民先生于1984年去世，只活了64岁。记得在我研究生毕业、赴大连工作的前夕，邓先生曾经在友谊宾馆为我饯行，喝的是红酒，吃的是红烧大虾。我到大连后，邓先生还几次给我寄来他撰写的宋明理学书稿，希望我和他合作，完成一个重要的科研项目。令人遗憾的是，我到部队院校工作后的环境条件完全变了，无法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这是使我非常内疚的事。

在我危难时曾经给予我帮助的郑金玲老师，后来嫁给了一位在水利水电部门工作的高级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是清末爱国名将左宗棠的后代，人很正派。可惜的是，郑金玲夫妇没有孩子；但是，郑金玲把小学里的所有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在教育战线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她现在也已退休。

我的母亲于2011年去世，活到94岁。她老人家从小是在旧社会天主教“仁慈堂”即孤儿院里长大的。母亲一生经历坎坷，多灾多难，但她的性格坚强，有毅力，从不服软，困难面前决不低头！她是我学习的榜样。在她生前，我对她很孝顺，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

现如今，在北京东郊有一片美丽、宁静的园地，园地中有一处不为人所知的角落，这个角落，就是近五十年前埋葬明明的地方。这片美丽的园地现在已经属于北京朝阳公园的一部分。在这片园地的附近，有一座装修得很正规、漂亮的游泳池，还有一道流着潺潺溪水的小河，河流上有一个新建的小水坝。我每年隔些日子，便会独自一个人来到这里，在原来埋葬明明的那个地方停留一会儿，沉思默想。

放心安息吧！明明。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和养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们没有虚度青春年华，没有碌碌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我们的爱。请你高高兴兴地等候我们在天上幸福重逢的那一天。

写于2016年春节前后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